

日本人的洁癖

陈希我

—

说起日本和大西北，想起了一个事。据说，曾经有日本人结队到中国的大西北来，植树造林，害怕中国的沙尘暴影响到了日本。最初听到这事，还讶然失笑，觉得日本人也太神经质了。当时还在日本，干净还好像是天经地义的。人对伸手即来的好处总觉得理所当然的，不知珍惜，比如母爱，甚至还觉得烦。失去了，才知道可贵。

在日本，皮鞋也是一周都不需要擦的。当然可以不擦，并不等于就不擦。卫生还是必须做。比如我的房东，七八十岁的老人了，坚持每天擦楼道。一桶水，三块布，一块沾水，另一块擦干，再一块把楼板擦亮。这还是对木板地，如果对榻榻米地面，更是细致呵护。现在国内许多房子都号称装修成“榻榻米”了，可是一看，只是铺上木板，以为“榻榻米”就是指木板地。其实，“榻榻米”是用蔺草编织成的厚草席。当然，近年来也有使用泡沫塑料的了，但不普及。整个地板用几块草席拼成，草席的

形状与大小有统一的规格，以织锦或黑布料滚边。一张草席的传统尺寸是：长 180 公分，宽 90 公分，厚 5 公分，面积 1.62 平方公尺，也有尺寸为 90 乘 90 公分的半张席。因为草席的大小是固定的，所以房间尺寸都是 90 公分的整数倍。必须说明，关西地区的尺寸要比关东地区的稍大些，我在东京，我房间里的就是 85 乘 180 公分，面积 1.53 平方公尺。一张草席，也叫一畳，“畳”，音“たたみ”(tatami)，所以，所谓“榻榻米”其实是度量房间面积的单位。

最初，榻榻米是只有贵族家庭才用得起的，平民百姓家里只能用泥土地。既然贵族用，就要用得像贵族。买得起，用得起，不能用成猪窝了。用草席铺地，是很容易变成猪窝的，必须加倍地养护，当年我就总为此苦恼。特别是要保持其卫生，实在是麻烦。又当通道，又当饭室，又当床铺。又是干净，又是脏，如何兼顾？只能往干净里努力了。进门要脱鞋，这对我没什么，我家乡就是进门脱鞋的。但是脱了鞋之后，就现出了臭袜子。所以脱鞋，就意味着袜子被亮出来检验。而袜子的干

净与否,又取决于袜子内外侧,即脚和鞋的里子。脚不干净,袜子也难以干净;鞋里子不干净,袜子上也会有印迹。黄永玉老先生说:婚姻就像穿在鞋子里的脚,舒服不舒服,只有自己知道;等别人知道了,这鞋子已经破了。其实鞋子不破,看袜子也知道。

住榻榻米房间,每天是要打扫的。如果你懒,至少每三天也要打扫一次。打扫时,用专用的扫帚,沿着草席编织的纹路打扫。现代社会有吸尘器了,可以方便些,但是也得缓慢操作,席面会划伤的。只干扫,是不可能干净的,还得湿擦。还不能太湿,容易发霉。擦拭时,得把抹布拧干了再擦。擦完后,还须记得把窗户打开透气。每年,还得寻个好天气,在持续两到三天晴朗时,晾晒一下,或者让干燥的风吹一天。晾晒时,要背朝阳光,如果让日光直射,容易褪色;吹风时,最好要掀起竖立着吹。草席容易长虫,但却不能用杀虫剂。这榻榻米,真是难伺候!

但榻榻米的难伺候,毋宁更像女朋友,一个很粘人的女孩子。榻榻米房间是要人常住的,最好不要超过一个月没有人住。它恋人,要人气。这样的“粘”,虽然有点烦,但也让人受用。榻榻米是有益于人的,比如能吸收对人体有害的二氧化氮,净化室内空气;又比如有保温断热的效果,冬天不让室内的暖气往外跑,夏天防止室外的高温进入;还能吸收多余的水分,室内空气干燥时,它又能将草秆中储蓄的水分排放出来,调湿空气;另外,榻榻米房间散发出的蔦草香味,还可以让人心静神宁,仿佛沉浸在大自然中,享受着森林浴。所以我们常见到这样的场景:日本人洗完澡,身穿宽松的浴服,光着脚丫,神定气闲地坐在宽敞、一目了然的榻榻米房间里,好像所有的烦恼和辛劳都消失了。这毋宁是进入宗教的境界了。确实,榻榻米跟神道是有着密切关系的,当然还有“准宗教”的茶道。这宗教的世界,是容不得肮脏的。

据考证,榻榻米是来源于中国的,唐朝时传到了日本。挖掘出的西安皇室古墓就可以证明。为什么在中国没有保持使用?也许保持清洁太难。

二

说起洗澡,我想起一件事。那年我刚到日本,我的一个中国人朋友到成田机场接我。由于我的护照上有澳大利亚签证,被盘查了半天。又因为行李被翻查,到出来时,天已经黑了。朋友把我从机场接到他替我预租的地方,说晚上有事,来不及了,叫来了他的一个朋友,一个女孩子,也是中国人。她把我带到一家中华料理店,吃了晚饭,又带我租的房子,说:“先去洗个澡吧,对面街上就有一家おふろ店。”

我后来才知道,“おふろ”就是洗澡,汉字写成“風呂”。她在日本呆久了,说话说着说着就日语了。

她又说:“到了那里,可不要害羞。”

我没明白,洗澡害羞什么?在很小的时候,大人剥去我的衣服洗澡,我害羞过。那是一种本能的反应,或者按我们当地的说法,是“痒”。“痒”跟“羞”的关系是很微妙的。稍大些,父亲把我带到公共澡堂,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得光溜溜的,我又害过羞,一直不肯脱下来,至于父亲骂和打了,才躬着身子脱了,羞答答地拿毛巾掩着下体,快快窜过人群,钻进汤池里。这阶段也早已过去了,为什么还要害羞?我没明白。

一踏进门,就有女性的声音响起来:“いらっしゃいませ!”我知道那是“欢迎光临”的意思。但奇怪,这里怎么有女人的声音?懵懵地把头挣脱出布帘来,真的是个女人,坐在一个小柜台里。这是一家私人开的澡堂,想必是管店的老板娘吧。有点害羞,我企图快快进去,可我发现,没有可进的地方。我边上都是

赤身裸体的人，他们就在这里穿脱衣服。我惊愕地再回头，那老板娘还在，跟这边相隔不过几米，毛孔都可能看得清楚。

我才明白那女孩子为什么说不要害羞了。

奇怪的是我身边的洗澡客没有一个害羞的，他们坦然地走来走去，还在电风扇前慢悠悠地吹干。我想起老家讲日本人的一句话了：“有礼无体”，果然是。可我是中国人。但也没办法，不能走出去，估计哪里都一样，只能背着老板娘脱了，用毛巾掩着下体，仍然背对着她，逃进里面的浴室。到里面才发现简直是徒劳，内间跟外间的隔墙居然是玻璃的，全看得见。只能快快洗了，快快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出来时，仍然背先出来，却发现柜台上的人换了，换成一个男的。总算释然了，但在出去交钱时，我发现，从他那角度，居然也把女宾那方看得清清楚楚。当然，柜台位置设在中间，能看到男宾部，自然也看得到女宾部。更让我吃惊的是，有的女客还赤条条跑到柜台这边来，要这要那，她一定也看得见男宾这边，一如我也看得见那边一样。

后来才知道，其实公共澡堂只是小儿科，还有男女混浴的。现在混浴的地方虽然少了，但是仍然有。据说现在有些旅行社为招徕生意，日本旅游中加进了“混浴”的项目，让中国人体验一下这种神秘。在中国人看来，日本人的洗澡，确实神秘兮兮的。但在日本人，洗澡大多只是洗澡。

甚至，洗澡还延伸出了处世态度。一个不爱洗澡的人，是鲜有人跟他接近的。假如你是个职人，你不爱洗澡，上司可能会想：这个家伙不爱洗澡，会认真工作吗？我曾听日本朋友说过一件事：他的一个同事一天早上来上班，被发现西装里的衬衫没有换。没有换衬衫，就说明他昨晚没洗澡，而不洗澡，在日本人几乎是不可能的。那只有一种可能：他洗澡了，但无法换衬衫。为什么无

法换衬衫？因为没有回家（家里的妻子一定会把丈夫的衬衫洗好熨平，待丈夫一天换一件的），那他也就是去旅馆过夜了。而一个人在旅馆过夜也几乎不可能，那么肯定是跟情人……果然，他有情人。

有人说，日本人所以爱洗澡，是因为日本气候的原因。东京年平均气温是15度左右，湿度达60%上下。特别是夏季，受太平洋高压影响，岛上水分大量蒸发，让整个日本国好像一个大蒸笼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身上就会黏黏糊糊，很是难受，泡在水里才最舒服。但这个归结似乎太唯物了，君不见一些比日本还炎热的地区，仍然并不钟情于洗澡。当然也许是缺水，但是也不是主要的原因。其实，洗澡跟吃饭不一样，吃饭是硬件，生存所必须；洗澡却是软件，重视了，它必不可少，不重视，也就可有可无，除非生出病来了，但那就转化成硬件问题了。其实所谓干净不干净更多的是一种感觉，这种感觉一旦被娇养了，干净就成了癖好，与实际上的干净与否无关了。

1995年，日本发生了“阪神大地震”，五千多人丧生，数万人无家可归，就在这种时候，日本人仍然把洗澡放在第一位。民意调查中有一项，灾民最感不便的是什麼？许多人回答：“不能洗澡。”日本政府立刻行动起来，会同企业，以最快速度推出了“移动风吕”，也就是淋浴汽车。但是要洗澡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所以不得不规定，每人沐浴不得超过五分钟。一些边远地区不能铺到此项服务，灾民就步行几十里前来，还冒着余震的危险，就为了这只能享受五分钟快乐。

三

“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”，日本人更是。这美，其基础是“洁”。我甚至认为，日本文化是以“洁”为根基的，比如他们的语言。

中国有“国骂”。当年,我就是揣着“国骂”东渡日本的,张口就出,而且觉得火力精确。但是日本人的反应却不像我预想的那样,他们的敏感点不在这里,在“八格牙路”。

“八格牙路”可以说是日本的“国骂”,汉字写作“马鹿野郎”,可以翻译成“傻瓜”、“笨蛋”。这来源于中国“指鹿为马”的故事。但是在中国,这个故事是关于权谋的,或者关于道义,而在日本,却成了关于能力的故事。但作为骂,“傻瓜”、“笨蛋”算什么骂?我曾试图寻找更恶毒的骂,但是很少。日本人的语言里,脏话出乎意料的少。跟英语比起来,也是少得可以。英语里的脏话,有人是专门出过词典的。法语据说是世界上最高雅、纯净的语言了,但是跟日语比起来,仍然不那么干净。

跟语言相对应的,日本的绘画也洁净。打开日本美术史,无论是哪个时代,无论是哪种绘画样式,无论是山水,还是花鸟人物,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:画面绝对洁净。洁净,似乎已成了日本人绝对的美学原则,无论是古代的表屋宗达、尾形光琳,还是现代的东山魁夷、横山大观,都是如此。

初次看到东山的画,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。当时还不知道有个叫东山魁夷的画家,只被那画面所震撼。不是因为其有力,而是因为其干净。或者说,是因为干净而有力。这是难以想象的,一般来说,力量来源于加法,无以复加,即是最大的力量。但是居然干干净净的东西也能震撼人。也许干净并不意味着单调。实际上,东山的画面色彩十分丰富,不像中国画那样,只用水墨,即使加上其他的颜色,基调仍然是墨色,避免突兀。东山的画似乎不在乎用色的突兀,但如此突兀,却给人干净的感觉,真是奇妙。

到了日本,我渐渐习惯了常洗澡,也渐渐喜欢上了日本画。我不是为学画而去的,那些去日本学画的中国人,当然更是被日本画所

吸引。按他们的说法,那些在国内被认为很亮丽的作品,带到日本,一对比,就黯淡无光了。甚至还有更玄的,说是在日本作画,跟在中国作画,结果是不一样的。在日本画的,画面自然而然就清爽了,真有点“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”的味道了。但影响确实是不可磨灭的,不仅是现在,很早以前就有了,比如大名鼎鼎的“岭南画派”,高剑父、高奇峰、陈树人都是留日的。从日本回来,居然丢掉了“浑厚华滋”,学了日本人的清丽干净,被中国主流画家们视为“小气”。虽然这些中国画家们很像鲁迅所说的,其实是画不来精确的涂鸦,但大凡糊涂就是“大气”了。

当然,日本人也不是只以明丽为美的,比如作家谷崎润一郎,就写过一本相当有名的书,书名就直接叫《阴翳礼赞》。他不仅自己礼赞“阴翳”,还将整个日本文化定义为“阴翳”。这个谷崎,历数昏暗的日本房屋、微明中的漆器、寺院阴暗壁龛里的名画、人的污垢和油烟及风雨留下的污痕,还有幽鬼般的女子,竭力证明日本人是“喜爱深沉暗淡的东西,而不是浅薄鲜明的东西”。这也就罢了,阴翳也是一种雅致。但他居然说,日本人所谓的“雅致”当中,实际上包含了不洁的、非卫生的成分。他是沾沾自喜地这么说的。他还取笑刷得洁白的牙齿,挖苦西式干净的厕所,不得不令人怀疑他是在刻意恶心什么了。

但是,刻意不也是一种认真吗?一个人刻意要赞美什么,维护什么,排斥什么,不恰恰说明他有着“洁癖”吗?

四

我小时候,学校经常响应号召,停课“大扫除”。看似把卫生都重视到了学习之上了,但其实是为了检查。单位、学校经常开展“爱国卫生运动”,很有意思,“卫生”跟“爱国”联系了起来。单位、学校之外,居住的社区也做

卫生,居委会大妈挨家挨户通知,上头发号召了,要检查卫生,定个时间,大家一起出来做卫生。其实所谓出来做卫生,不过是把自家门前的卫生做做罢了,远离家门的,由居委会的人做,或者他们找人做。

中国人的卫生,往往仅止于自家及方圆两米之内的。之外的,就与己无关了。中国历来有“国家”一说,“家”、“国”同构,其实在内心,是只在乎“家”,不在乎这个“国”这个“公家”。所以我们老倡导要遵守公德,不损坏公物,所以要倡导,就是因为缺乏。“公”的地盘,就是谁都不管的地盘,也就是谁都可以侵占的地盘。这种“越界”,是谁也不觉得不妥的,因为“公”不属于谁,不知道“公”是属于“任何人”的。当然“任何人”,也有“我”的一份,可以因有“我”的一份,而占据了全部。似乎不只是中国,世界各地的纷争,不都是如此吗?

现代社会,“越界”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了。日本人似乎很重视界限的。什么是自己的,什么是别人的。别人的东西送给了自己,一定要等值奉还。所以日本人送礼,不会送得太贵重的,那样接受方会很有压力,所谓会让人有“赚礼”的嫌疑。他们不喜欢拉拉扯扯,就是一起出去吃饭,也是AA制。很多中国人不喜欢,认为小气。但是大包大揽要为别人买单,心里却想着下次应该由对方买单,对方不买,就不舒服,哪里是真正的大方?不过是粘乎乎罢了,到头来弄得彼此都不清爽。

清爽,就是把一切剔得清清楚楚的。就好像我们整理房间,该放哪里的,就放哪里,做好了,洗手,叉着五指,凉爽爽的,那个惬意。因为职业,接触日本文献,惊异于他们学问做得那么精细,特别让我受用的是分类整理,做得那么好。每当这时候,就会想到整理房间后的这个动作来。我想象日本学者在做完这些工作后,叉着手指清爽享受的样子。日常生活中,日本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,

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整理归拾上,永远没有完结的时候。得到的回报,往小里说,是家庭生活的精致美观,往大里说,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。性格决定事业,在事业上,他们也取得了很好的成就。

有日本学者发现,早在江户时代,在全日本,就几乎建立了各村文献,包括“检地帐”、“名寄帐”和“宗门帐”。“检地帐”是关于每年登录的土地,“名寄帐”是关于年贡,“宗门帐”是关于户籍。当时日本每一个村的户数是多少呢?平均是六十户,这样的村落,居然都建立了文献,日本人简直有着“文献癖”。

看日本文献,有时候会看得你头昏脑胀。比如过细的分类,就令人眼花缭乱。比如武术、相扑、书道、绘画、舞蹈各界,门派、流派多如牛毛,技法各不相同,规矩纷繁复杂,不得越雷池半步,让我这个性格往好里说是粗放,往孬里说是粗疏的中国人很难适应。上世纪初中国有个武侠小说家,叫平江不肖生,是民国初期“黑幕小说”的始作俑者。他写了一本《留东外史》,专门暴露留日学生的丑态,大多属于实人实写,里面就写到了中国武术与日本武术交手时遇到的麻烦。中国的武术在项目上没那么多区分,比赛规则也较简单。日本则不然。小说写到日本裁判对前来打擂台的中国武士萧熙寿作出规定:“不能用腿,不能用头,不能用拳,不能用肘,不能用铁扇掌,不准击头,不准击腰,不准击腹,不准击下阴。”到交手时,萧熙寿连连被判犯规,一气之下,退出了比赛。

这里有没有民族歧视的成分?不好说。但日本人跟日本人比赛,也是如此规则林立,不能逾矩的。一方面要战胜,一方面要限制。也许“没有规矩,不成方圆”?“方圆”是在“规矩”中产生的,就好像清洁是在不清洁环境威胁下产生的一样,“出淤泥而不染”,才是真的“洁”。

“洁癖”从心理特征上说,是一种完美欲。事情要做到最好,做到极致。越是不容易做好,就越要做好。因此也容易走入强迫症。江户时代有个町人学者,叫富永仲基的,曾经比较印度、中国和日本的国民性:“若论国民性,印度人是‘幻’,中国人是‘文’,日本人则可以‘质’或‘绞’来代表。所谓‘绞’,就是过于正直和认死理的意思,换言之,就是日本人头脑相当简单、正直,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,日本人是理解不了的。”当然,正直,是道德化用语,不可当真。

“洁癖”具有极端排他性。日本一个生物学家曾经拿西欧蜜蜂跟日本蜜蜂的生态习性做个实验,发现:将两者的蜂巢互换,对日本蜜蜂的旧巢,西欧的蜜蜂可以习惯地利用,但对西欧蜜蜂的旧巢,日本蜜蜂却不屑一顾,而将它咬坏,再筑自己的新巢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日本人的生活习性跟日本蜜蜂很类似。在日常生活中,日本人忌讳使用别人的东西,哪怕是一家人,也是一样。在电视剧里,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节:父亲不小心错用了女儿的饭碗,女儿才六岁,就已经有“洁癖”了,抗议道:“脏,脏,父亲真讨厌!”也许,“他人不洁”的观念在日本人血液里就有了。“他人不洁”,有点“他人是地狱”的意味,但这并不意味着以邻为壑,而是自己缩紧。日本人很回避身体接触,很多时候,很多场合,他们彼此不得不靠得很近,他们就竭力缩紧自己。人毕竟是群居的动物,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更是举世共知,日本人一方面喜欢群处,另一方面又竭力跟他人保持着距离,真不知道他们怎样练成了在拥挤的空间里互相隔离的奇特的能力。

五

据我理解,信仰的要义就是给自己困难,让自己行不能为之事,从而产生与众不同的

崇高感。因不能为,所以为之。困难多,则乐趣多;越是受难,则越有升华的感觉。所以有信仰的人是会创造出惊人奇迹的。

日本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,虽然有基督徒,也有穆斯林,但只是少部分;虽然日本人很信佛,虽然遍地是神社,但大多也只是跪跪拜拜,跟中国没什么两样。但是他们却有着宗教式的清洁欲求,简直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。我很奇怪,他们的精神动力是在哪里?大概也在于对受难的特别理解,明白地说,是把受难理解成了享受。这种享虐倾向,弗洛伊德曾经从人的“死亡本能”上来解释,但更多的研究者认为,那是人把痛苦变成了快乐,是经过心理转换的。比如男人喜欢喝烈性酒,女人喜欢穿高跟鞋,都是让自己痛苦的事,但是他们却乐此不疲。再比如以读书为乐,其实也是经过心理转换的。读书其实是很苦的事情,如果问一个孩子,喜欢读书还是喜欢玩,一定会回答后者。这是人的本能。但是如果你认识到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、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,那么就会喜欢读书了。读书苦,仍然没有改变,但是在心理上改变了。

所以我们能够理解,那些朝圣的藏民,他们在向圣城拉萨朝拜的途中,为什么要三步一叩头,并且是五体投地,绝不敷衍、偷懒。他们愿意花上几年的时间去接近心中的圣城。有人做了计算,如果一个朝圣者从西宁出发,要到拉萨,即使他身体健康,沿途没有遇到暴风骤雨、山洪雪崩和酷暑严寒,没有缺水断粮,就按平均每天五公里的速度,这单程近两千公里的路程,至少也要花去两年半的时间。汉人喜欢乘飞机乘车去西藏,或者自驾,都是很享受的。虽然很多人下了受苦的决心,但也是去猎奇。虽然有追求精神的初衷,但也不过是时尚化的,是附庸风雅。受难才是真正的雅,虽然可能千疮百孔;受难是一种高级,虽然以一种匍匐的姿态;受难是灵魂的狂欢,虽然很痛苦;受难才能达到圣洁,虽然已经衣裳

褴褛——因为心能够改变一切。

当一个人全心投入到某个事情上去,他也已经有了信仰了。他信仰的是他所投入的东西,这时候,那东西就已经不是那个东西了,而是神。它不能被敷衍,更不能被亵渎,必须把它高高举起,必须为它付出全部,哪怕是生命。因为它已经是精神性的东西。洁癖,难说是物质的,还是精神的。也许最初是物质的,但是当它的需求成了一种道德伦理,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了。日本近代有个学者,叫冈仓由三郎的,他在《日本的生活与理想》中说:“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,很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系的厌恶污秽。否则无法解释这些现象:我们被训练成(实际情况如此)遇到侮辱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,就视若污秽或疮疥,必须通过申辩洗刷干净,否则就犹如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。对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见的报仇事例,不妨看作是一个喜爱洁净成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。”

这里,把精神跟物质绑架在了一起。这里展示了肉体和精神的逻辑纠葛:家庭名誉和国家荣誉被污蔑了,就等于身体有了污秽,就必须通过“晨浴”来洗刷,而“晨浴”并不是普通的洗澡,又是精神之“浴”——雪耻。不这样,就不能恢复身体健康,延续生命。

既然名誉和荣誉如此重要,任何对它的冒犯,当然就绝不能容忍。看时代剧,我们常看到武士拔刀决斗的场面,甚至为此送掉生命。其实不过因为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冒犯。当然这是在我们看来的,在他们心目中,这可不是小小的冒犯。《忠臣藏》里就讲了四十七个忠义浪人,抛弃一切,为主君复仇而后集体剖腹自杀。演绎出如此血流成河的故事,起因却只是他们的主君自尊心受辱。当然其中还有“忠”的成分,所以叫《忠臣藏》,其主旨也在于“忠”吧。对主子之“忠”,但其实同时也是保持自己的操守。对武士来说,不忠即“耻”,这是武士的“义理”。为了这“义理”,《罗生门》里的

真砂不惜把杀人之罪揽在自己身上,即使被判死,也要保住“义理”。日本人对“义理”的维护,可谓到了极致了。

“义理”,是打开日本人内心的重要钥匙。它是日本人的荣辱观,是他们特殊的价值观,某种意义上说,是他们的教义。日本人所以让人费解,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他们看重什么。在我们看来很重要的,在他们看来,却并不重要;相反,在我们看来并不重要的,在他们,却比生命还要重要。所以有时会觉得日本人太斤斤计较。美国人鲁思·本尼迪克特在她的《菊与刀》里,讲述了这么一件事:一个名叫牧野芳雄的日本画家,年轻时为了摆脱贫困,出人头地,去美国闯荡。他去请教一个美国传教士,却遭到了传教士夫妇的嘲笑。也许对方的嘲笑未必恶毒,但是在这个日本画家心里却掀起了万丈波澜,他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侮辱了。直到中年,在美国功成名就的他仍然对此耿耿于怀,他在自传里写道:“我总坚信,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就是对人不诚恳,而嘲笑人则是不诚恳的。”他还说:“对人们发怒,我常常原谅,因为有时脾气不好是人的本性。人们向我撒谎时,我一般也能原谅,因为人性很脆弱,在面对困难时不够坚强,不敢讲真话,对无根据的流言蜚语、背后议论,我也能原谅,因为遇到别人说闲话时,难免不陷进去。甚至对杀人犯,我也可以酌情体谅。但对嘲笑,则无可原谅,因为只有内心不诚恳,才会嘲笑无辜者。请允许我对两个词讲一下我自己的定义。杀人犯:杀害某人肉体的人;嘲笑者:杀害他人心灵的人。心灵远比肉体宝贵,因此,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。那一对传教士夫妇实在是要残害我的心灵,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创痛,我心里在叫喊‘你为什么……’!”

夏目漱石有个小说,名字叫《哥儿》,里面也有这样一个情节:主人公哥儿喝了朋友请客的一杯冰水,价值一钱五厘。之后有人在哥

儿面前挑拨,说那朋友在背后说他坏话,哥儿马上想到了那杯冰水,第二天,就把一钱五厘扔到了那朋友的桌子上。他认为,虽然只是一杯冰水,接受这种表里不一的人的恩情,实在有损自己的面子。虽然只是破费他一钱五厘,但一钱也罢,五厘也罢,接受这种骗子的恩情,死了也于心不安。受别人的恩惠,默不作声,就表明尊重对方,看得起他的人品。自己喝的那杯冰水,本来自己付钱就可以了,但他却硬要争着付,弄得自己心里总感到内疚,这可是金钱买不到的。自己虽然无权无势,却有独立的人格。要自己低下头去接受别人的恩情,简直是一百万元的回敬。

这一钱五厘让他想得如此多,如此原则,这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。曾经,我们也有女工因为被冤枉偷了十元钱而自杀,舆论想到的是:她为十元自杀,不值。没有人想到那已经不是十元钱,而是关乎人格。

六

我的长篇小说《移民》,里面有个日本人叫渡边的,是白领,是我在日本期间再熟悉不过的典型的日本人。其实在当时,我就在随身带的笔记本里给他画了速写,其中心词就是“精致”。

精致,并不只是“小”,把日本人趣味理解成“小”是片面的。与其说日本人喜欢“小”,勿宁说日本人讲的是“精”,精到极致,不达完美绝不罢休。

中国人喜欢嘲笑日本人,得意于自己的地大物博,人口众多,殊不知,日本虽然地不大,但能够极其有效而且科学地利用;本土的物产不多,但却物质极度富足,而且全是优质的;至于人,众所周知,日本人是世界上国民素质最高的国家之一。日本的精致,是着重于实质上的。

我说日本人重实质,一定会有许多人出

来反对。比如我前面提到的平江不肖生。在他的《留东外史》中,恰就写到了相反的例子。他引用中国武林高手郭子兰对日本剑道的批评:“日本射法流仪太多,闹不清楚,其实没有什么道理,拈弓搭箭,手法微有些不同,又是一个流派。”另一个叫黄文汉的,说得更刻骨一些:“大凡一样技艺,习得一多,就不因不由地分出流派来,其实不过形式罢了,精神上哪有什么区别?都是些见识少的人,故意标新取异地立门户。”哪里是重实质?分明是地道的形式主义嘛!

不仅中国人,西方人也有类似的说法。法国人罗兰·巴特在他的《符号帝国》中,就用“套盒”来比喻日本文化特征。日本文化的本质就像日本传统工艺品——漆器套盒,从大到小,一个盒子套进另一个盒子,尽管里面空洞无物,但是盒子却很精美。他称说,这是“一种极端的艺术创作”,也就是包装的艺术。

和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,很多都有类似的经历:接受礼品,看着掂着挺有分量,打开,是一层包装;打开包装,又是一层包装;再打开包装,仍是一层包装;最后终于看到礼品了,却是一把小扇子,或者一双筷子,或者一条手绢。确实是包装重于礼品,形式大于内容,正如罗兰·巴特说的,礼品是盒子。

顺便说一下,罗兰·巴特所说的漆器套盒,并非是日本专有,中国也有,而且日本是从中国传过去的。只是西方人不知道,就好像他们一想到东方绘画,就想到浮士绘一样。我的家乡就有很多脱胎漆器,当年去日本,也带了几个去,送日本人,结果到了日本,不好意思拿出来了。同样的东西,人家做得精美得多。这就是日本人的产品。罗兰·巴特所见到的,也应该是这样的产品吧,即使只是作为包装。一个包装盒能够做得如此精美的民族,内里的礼品,能做得不精致吗?

但是仍然有人不认可,那就是我所写的

渡边先生。作为日本人,他最有发言权。他深陷在这种的精致之中,那是铺天盖地的网,那是沁入毛孔的风。是的,它是内容,也因此更令他欲罢不能。它成了深入骨髓的法则,不能越雷池半步。“水至清则无鱼”,我们可以想象,渡边在这种环境中如何奄奄一息。一切都是经过精心包装的,他简直生活在套子里。生活用品都有它们的套子,西装放进橱子里,有防尘套;随身听录音机也有套;手表有表套;书有书套;名片、梳子、伞、镜子、月票、电话卡、银行卡都有套子;甚至给你发票,也用个塑料薄膜套着。

不仅如此,还有无形的套——他是课长,要进课长的套;他干商卖,要进商的套;他是男人,要进男人的套;他是丈夫、父亲,要进丈夫、父亲的套。他一身西服套装,头发一丝不乱,好像戴着头套。举手投足,彬彬有礼,走路板着身体,办事小心翼翼,说起话来要合礼仪。他一年到头提着手提包,提包里面也各种各样的套子:放笔的,放纸张的,放书类的。午饭也是装在套盒里的,吃完了还是这个套盒,没有吐出一点残渣,把盒子盖上,拿走,跟拿来时一模一样。他所见到的也是套着面具一样的脸,上下级的、客户的、服务人员的,那些脸本质里是冷的,活像能剧的能面具。就连老婆也用假声跟他说话。她自从意识到自己是成年人之后,就用假声说话……

于是他在上班之余,喜欢跑去酒吧。他晚上都是在酒吧泡掉的,在那里,他可以换一个人,可以把领带狠揪,放得宽宽的。他会把发票塑料薄膜发脾气。他会把塑料袋吹大后,拧紧口子,再一巴掌把它打破,让它发出爆破的声音。他让脚从擦得锃亮的皮鞋里抽出来,用脚指尖挑着鞋子一翘一翘地晃动。有时他干脆把它脱下来,提议酒吧女们也把鞋子脱了,搅在一块,然后他们的脚在桌子底下捉迷藏。他故意用脚趾去钳女人的脚,弄得女人尖声叫起来,他却装作莫名其妙,瞧着

别人。喝醉了酒,他可以在大街上拉开裤裆,对着汽车撒尿,觉得特别快意。他喝醉了,喝醉了就有特权。有时候他也带女人去旅馆。他最不能忍受的是还要用避孕套。简直是穿雨衣洗澡!他对美国人的这个比喻特别感同身受。女人会帮他套套套上去,有的还会好言好语地哄他。他觉得自己乖乖让对方套的样子,更像一个犯人老老实实被警察套上枷锁。他每每伺机把它悄悄抽掉。“用这套套,不如不做!”他说,“我讨厌艾滋病,但是我更讨厌避孕套!”

“日本人个头越来越大,东西却越用越小!”他常说,“整个日本列岛都可以装在口袋里!”他从衣袋里掏出电子通帐,里面有日本各都、道、府、县的资料。何止,还有全世界的资料。他突然把手一松,电子通帐滑落在地:“地球爆炸啦!”

但是地球并没有爆炸,日本是个井然有序的国家。他的突围,只能是虚拟的。他被控制在这种法则中。疯狂了一个晚上,第二天还得照样去接受那种法则,尽管内心大不以为然。

于是我们看到,形式又确实大于内容了。虽然渡边们都不认可这种束缚,但是他们又都遵守了,并且遵守得很好。于是我们看到整个日本社会对规则的绝对顺从,不这样,就被罢黜于日本社会。当形式大到能够吞噬内容了,其景象是多么的可怕。于是我们看到,即使有异端,也很快式微了,被阉割了,被同化了,被清洁化了。即使有人坚守着内心的独立,但又能坚守几何?心是会游移的,心靠不住,这点上,当代企图守住“底线”,“底线”却在步步调低的中国人,一定深有同感。哪怕是信仰,也是集体共同意识的产物,如果被共识为“异端”,没几个内心不打鼓、能够坦然的。而法则是明确的,也是容易把握的。只要符合一定的指标,甚至只是合格的程序,就可以被认可,就可以心安理得地

“越界”，哪怕是杀人放火，但只要语言干净，就可以被文明化，哪怕是强奸敌国妇女，只要有崇高的理由，就可以坦然行之，只要厘清“从西方人手里夺回亚洲”的逻辑，就可以“越界”侵占他国。

哪怕是被确认为犯罪了，也可以通过仪式来洗罪。其实，日本人的“晨浴”，有一种洗罪的仪式，那就是沐浴戒斋，然后去神社举行禊祓仪式。经过这种仪式，犯了罪的人就清白了。对日本人来说，犯了罪，只要经过一次或多次的“晨浴”，就可以清白了。于是，无所谓

清白，无所谓罪恶，所谓“洁”，某种意义上只是“空洞”。空洞是极其可怕的东西，不问内容，只知形式，任何内容都可以装进这个形式里，包括暴力。

其实，清洁本身就是滋长法西斯的温床。希特勒当年就是以清洁的名义施行屠杀的清洁，有多少罪恶假你之名？在追求清洁之下，潜藏着多少暴力的危险！

陈希我，作家，现居福州。主要著作有《抓痒》、《我们的苟且》等。

《开放时代》(双月刊)2013年第3期目录

专题:国家治理

周雪光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:
一个韦伯理论视角

何艳玲 “回归社会”:中国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
结构调适

樊 鹏 论中国的“共识型”体制

人文天地

王才友 被动与主动之间:江西暴动的策动
与终止(1927~1928)

经济社会

王绍光 大豆的故事——资本如何危及人类安全

柏兰芝 集体的重构: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产权
制度的演变——以“外嫁女”争议为例

肖文明 国家触角的限度之再考察——以新中国
成立初期上海的文化改造为个案

秦 洁 “忍”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——基于对
重庆“棒棒”城市生活心态的深度访谈

传播与网络

曾繁旭 运动企业家的虚拟组织:互联网与
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新模式

动态

村田雄二郎 超越“纪念史学”——日本纪念辛亥
革命100周年国际会议

阅读

方朝晖 什么是中国文化中有效的权威?

——评白鲁恂《亚洲权力与政治》一书

陈 明 太平天国与基督教问题漫说

——评周伟驰著《太平天国与启示录》

地址: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云安路119号。

邮编:510410。电话:020-86464940。

传真:020-86464301。邮发代号:46-169。

网址:<http://www.opentimes.cn>。

投稿邮箱:opentimes.cn@gmail.com。

官方微博:<http://weibo.com/opentimes>。

部分城市经销点:三联韬奋书店(北京)、万圣
书园(北京)、季风书店(上海)、学而优书店(广州)、
三联